

具有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的农业



朱启臻

■朱启臻

北大的钱理群教授曾说,北大在培养“精细的利己主义者”。我相信农业大学一定在培养利他主义者。为什么呢?因为从事农业的人是为全社会作贡献,是为人利益而存在的。

记得在一次关于农村发展的论坛上,有一些学者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安徽小岗村之所以到今天还穷是因为他们分田单干,走了单干的道路;以华西村为代表的明星村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走了集体化道路。他们举了大量的例子,如华西村、南街村、山东龙口的南山集团等等,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凡是要想富,就要走集体化的道路;凡是分田单干的,就只能受穷。”这个判断得到了众多与会者的响应。有位老同志问我的看法,让我对这种主张作个评论。我对他们说,你在全世界范围也很难找到走集体化的道路靠种小麦和玉米发了财的人;但是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搞工商业发家致富的个体户。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发财或受穷并不在于他分田单干还是走集体化的道路,而在于他从事的是农业还是非农业。

那些明星村没有哪个是靠农业发展起来的,靠什么?靠工商业。农业与工商业的最大不同在于一个是“公活儿”,一个是“私活儿”。农业是“公活

儿”,学术一点的术语称为“农业是公共产品”,也有人说是准公共产品。我呼吁了好多年,就是要让公众知道,农业并不是一个生产者可以靠此发财的产业,它不遵守“物以稀为贵”的经济学原理,道理很简单,当一个国家的粮食发生短缺时,政府会动员国家的力量平抑物价,可以采取限制消费、制定最低价格等强制手段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因此想卖高价是不可能的。前年发改委不是对炒作绿豆的公司给予了处罚吗?但是没听说对炒作手机、炒作房地产的公司给予处罚。为什么?这是农业的特性决定的。因为农业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温家宝总理讲过,哪怕未来农业产值占GDP的百分之一,但有一个事实是难以改变的,那就是百分百的人都要吃饭。农业安全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一个国家内,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买得到、又买得起足够的农产品。这里的任何人当然包括穷人,穷人也买得起粮食和蔬菜,这是不懂农业的表现。明天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富人买便宜的农产品。有人主张粮食涨价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这是不懂农业的表现。农产品涨价了,穷人怎么办?农产品涨价,自给自足的农民能受益吗?当然,农业也不遵守“薄利多销”的规律。近些年“卖难”已经成为威胁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卖白菜难、卖柑橘难、卖土豆难,诸如此类,通过降价能促销吗?不能,因为人们的消费量是一定的,消费者不会因为生产者降价就提高消费量,而且农产品的消费具有替代性。也就是说,你今天多吃了苹果,就要少吃柑橘,明天多吃黄瓜,就要少吃萝卜,当农产品供给过剩时,靠信息促销、靠降价促销都不起作用,经济学家称为需求弹性小所致,这就是农业。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特性,如正外部性问题,农业保持水土、净化空气、减少噪音、提供农业景观等等,全社会享受农业带来的诸多好处,但是农民付出了却难以得到回报。所以说,农业生产干的是“公活儿”。

工业与之相反,它排出的“三废”,污染了空气、污染了水源、污染了土地,其成本由全社会承担,发财却是少数人的。所以说工业干的是“私活儿”。工业是可以赚钱的行当,农业不是。农业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就是从事这种对全社会有好处,而自己得不到更多实惠的行业。农业是利他的产业,是值得全社会尊重的产业。可以肯定地说,社会越发展,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地位会越高,会受到更多的尊重。

说到农业科技,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科技的判断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即提出农业科技具有“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人们势必疑问:农业科技为什么会有这三个特性呢?是什么决定了这三个特性呢?原因很简单,就是由农业的“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所决定的。因为农业有这“三性”,决定了与农业有关的很多方面都具有这“三性”。过去由于我们认识不到农业和农业科技的这些特性,错误地把农业科技作为农民致富的工具或手段,结果使我们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受到重创。原因很简单,既然农业科技可以为农民增收,那就让农民购买科技成果,农业科技人员也可以从中受益,因此,就给农业科技人员“断奶”了,科技推广队伍也就随之“线断、网破、人散”了,只要有精干机构、机关裁员的事,领导首先就会想到农业推广人员,这个损失就是源于对农业科技的错误判断。

几年前我在农业部举办的一个讲座上提出:农业部不要再提“科技可以给农民增收”这样的说法,这样容易误导人们忽视农业科技的国家责任,而加重农民的负担。农业科技是公共产品,农业科技的进步是国家的事情,不要和农民增收联系在一起!现在,中央明确了农业科技具有“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这就为保障基层农业科技人员的待遇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农业科技人员无疑是个极大的安慰,对中国农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大学学生关心这样一个问题:

即农业科技和农业人才往哪儿走,何去何从?农业人才一定是跟着科技走。农业科技往哪儿走?农业科技无论是研究还是推广或应用,都是政府的重要责任。国家正在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农业科研经费在迅速增加,要出原创性的成果,要出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农业科研成果;国家要建立完善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基层推广人员的待遇要和事业单位相接,如此等等,为农业大学毕业生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就业空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号召,未来的新型职业农民,是具备较大规模经营、具有较高收入、具有新的农业发展理念和掌握了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新型人才,随着人们对农业的重视,新型职业农民也必然成为受社会尊重的群体。此外,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的管理者等都为农业大学毕业生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简单地说,凡是与农业有关的岗位都是农业大学毕业生的舞台。

哪些岗位与农业有关呢?涉农岗位很多,最大的涉农岗位是省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如果省委书记、县委书记不懂农业,就会瞎指挥,所管辖的老百姓就会遭殃;政策制定者如果不懂农业,制定出的政策就脱离实际。农业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很难说哪个地方与农业无关。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农业服务体系、农业流通领域、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等众多的岗位等待着大学毕业生施展自己的才华。

但是,我们必须有为社会作贡献的本领,这就要求在校的学生学好专业课的同时还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了解中央政策,了解农业政策和农业的未来走向;二是了解农业对人才的实际需要。这样,我们就有了努力的方向。我们要抓住这个优势,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走出一条为社会作贡献的路。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由本报记者温新红根据作者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才论坛”上的演讲记录整理)

从文明兴衰看人口规模与结构



李建新

■李建新

30多年来计划生育广泛深入地宣传,已彻底改变了国民对我国人口问题的基本看法:我国众多的人口已成为“洪水猛兽”。下面,我将分别从人口变迁与发展的关系、人口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人口更替与大国兴衰的几个角度来展开对当今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及讨论。

人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如果从历史的、宏观的视角来考察这一问题,我们发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很难找到一个人口呈递减(负增长),而经济呈增长的地区或国家。

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也表明,我国不断增长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广大的市场潜力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理论与实践证明: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于某一时点上人口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变化过程中人口内部结构是否合理。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庞大的人口数量一直给我国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且还与一些资源环境问题直接有关,但是,人口数量是不是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是不是减少了人口数量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呢?

影响资源环境问题的因素很多,人口是一个影响因素但不是首要因素。谁都知道,2亿多人口的美国每年向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远高于13亿人口的中国。因此,当今资源环境问题的发生和解决不是人口数量所能左右的,资源环境问题最终只能在可持续发展中得以解决。

固然,减少人口规模会对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以追求“数量第一,结构第二”的方式来解决人口环境问题是不明智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推行节约型社会建设,并形成良好的循环经济,才是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的最佳办法。

人口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到2000年第五次普查,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更是严重不平衡。2000年的普查分析证明,性别选择(B超)的人工流产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最主要原因。从深层原因探究,我们又不得不将之与现行生育政策联系起来。一方面,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一孩生育政策并没有给人们性别选择留下空间;另一方面,现行生育政策(农村“一孩半”政策)又在重男轻女的土壤上诱发出了出生性别比特别是第二孩出生性别比偏高。我们已经看到出生性别比偏高所带来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从社会学角度看,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在家庭成员关系结构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独生子女核心家庭的夫妻关系是简单的,家庭成员之间只形成三种关系(夫妻、父子、母子)。对子女来说,这种关系的特点是,他们只有上下的代际关系而没有平行的血缘同辈关系。这极大地影响了孩子的成长和教育。

在独生子女家庭中,从上下关系来看,祖、父母对子女施予爱、亲情或期待,都更可能出现专家们所说的“溺爱”,更易强化自我中心意识以及易形成骄横、抗逆力弱等心理特征。从同辈关系来看,因为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只有与父辈和祖辈的交往,而没有兄弟姐妹同代人之间的平等互动,失去了在兄弟姐妹“玩耍”中习得合作、谦让、关爱、责任等品质的“机会”。近十多年来,我国心理健康问题青少年人口呈快速上升趋势,不能不说与这种固有缺陷的家庭关系结构有关。

所谓问题都有其成为问题的客观事实基础。剩女剩男是跟男女婚配人口比例失衡有关的问题,而男女婚配的基础是其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就人口来说,事实是这样的:由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生性别比一直偏离正常值范围,2010年依然保持在失衡水平上。所以,当这部分人口进入婚配期时,必然会出现“婚姻市场”上可供选择的女

性人口大大小于男性人口的现象,造成婚姻挤压。

推算数据显示,2020年,22岁~34岁男性人口将比其婚配的女性人口多出2600多万。由于我国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从上世纪80年代持续至今,所以,即便是从现在起出生性别比迅速恢复到正常值范围,适婚男性人口绝对过剩的婚姻挤压现象也会越来越严重且会延续到2030年以后。

从这个意义上讲,剩女是个伪问题,剩男是个大问题。事实上,剩女多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剩男则更多是条件所限的被动结果。剩男多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他们的基本特征是:自身经济、文化等资源处于劣势;被社会排挤和歧视;有旺盛的生理需求却又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满足。这样一群被社会遗忘的社会底层大众,若没有必要的“安全阀”,必定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人口与大国兴衰的关系

一般认为,国家实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政治稳定及能力等。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现代史战略研究课题组有关国家实力的研究报告中,课题组所引用国外专家或机构关于国家实力或权力(power)概念中,皆把人口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要素;而引用国内同行的研究中,都没有出现人口要素,这或许与我国长期宣传人口众多是一个沉重负担有关。

在分析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时候,可以从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方面来分析。硬实力(Hard Po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Soft Power)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

大国硬实力或文明的能量在一些国外学者如亨廷顿看来,主要是由一国的领土和人口、经济实力、军事能力等构成,而在构成大国硬实力的要素中经济实力又是最关键。那么人口要素与核心实力经济成长又是什么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国外学者特别是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以动态的人口结构视角作出了回答。从人口要素上讲,稳定的劳动力人口规模,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人口结构是保证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的积极条件。

大国实力的较量也是软实力的较量。人口要素怎样影响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呢?具体说来,首先,人口规模是一个文明规模和能量的基础,是一个文明、价值观的基本载体;其次,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是文明价值体系保持活力和应对外界挑战的必要条件;其三,人口素质则是传播文明和文明吸引力的必要要素。

如果说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是谁,当属中国和印度。作为20世纪后半叶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毫无疑问走在了印度的前面,但是21世纪中国印度谁将走得更远?从人口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的人口形势并不令人乐观,特别是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加速的老龄化过程。因此,仅从人口学的角度,从动态的结构视角,从中印两国人口要素的动态比较上看,中国人口实力明显不占优势。

我们并不能预测未来,大国兴衰的历史事实上是多种看似独立发展但却相关的因素耦合的结果,不存在任何单一的决定性因素。不过,由于人口是最基础性和持续性的因素,其变化对民族、对国家的兴衰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

实际上,人口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最久远的、最基本的承载体。我们必须从世界人口变迁的历史看中国人口的变迁;必须从文明兴衰的历史看人口规模与结构的重要作用。

盲目追求减少中国人口数量的目标,既忽略了中国人口规模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减少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后果,更没有看到在追求减少数量过程中人口结构迅速变化对中国文明自身兴衰的冲击,对世界文明和平进步的不利影响。我们需要在更具长远、更具开放的时空上重新审视中国人口发展战略。

今日倡导开放生育政策,一方面是实践“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关注民生权益的实践;另一方面,中国人可以多样,不是要追求人口数量目标,而是为了调整已经严重失衡的人口内部结构,以首先实现人口自身的长期均衡发展。人口自身的长期均衡发展,才能保证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最终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长盛不衰。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由本报实习生张涛根据作者讲座记录整理)

■丁邦平

科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人类反对神学,张扬理性,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和最有价值的知识。当前,不管是科教兴国,还是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国家政策立足点而言,科学无疑受到了党和政府极大的关注。而科学教育作为培养未来科学技术人才的主要途径,却在我国遭受冷落。中小学科学教育的教学质量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科学仍旧作为确定性的知识在课堂上被传授,学生的科学素养仍未提升等。而小学科学虽然在新一轮基础教育新课标中确立为一门新学科,但普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教师素质也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张荣华博士的新著《课程视野:小学科学教育的挑战及应对》,对于我们了解当前小学科学教育的现状,构建合理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小学科学课程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书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课程理论的独特视角

课程是一个复杂的事物。随着课程领域的范式转换,课程逐渐作为一种多元文本被理解。而此书正是超越传统的课程开发范式,构建一种新的文本的尝试。张博士由课程的五个层次出发,构建了此书理论框架。作者在古德莱德的五个层次的课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想课程、正式课程、可理解课程、实践性课程和经验课程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诠释了小学科学课程的内涵。正如作者所言,课程是一个复杂的事物,作者能够以复杂的视角审视课程,以新的框架构建课程,体现了宝贵的创新精神和勇气。

(二)全面的历史探索

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人类是生活在时间的深度上的,现在的行动的发生不仅在于预示将来,而且也基于过去。因此,全面地考察历史,不仅有助于分析当前的问题,而且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实事求是地讲,作者对于小学科学教育的历史考察,不仅关注了国内,而且拓展到国外,这对于比较国内的小学科学教育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小学科学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科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作者在课程的五个层次的理论框架之上,首先论述了小学自然课程的历史之路,对自然课程——科学课程的前身,生存与发展之路进行解读,对于全面了解科学教育的历史有重要意义。此外,在介绍国外小学科学教育的历史脉络时,作者在重点介绍美国小学科学课程特点的基础上,还概述了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小学课程发展历史,为国内研究者和教师了解国外小学科学课程的特点、特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三)强烈的实践关怀

在教育学的学科地位窘迫的今天,作者能够走出象牙塔,扎根于实践,不仅能够填补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而且体现了教育学者的实践关怀与精神。作者考察了中国新一轮科学课程改革的状况,发现了小学科学课程的主要问题,这对于反思新课改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作者经过对上海市小学科学课程师资队伍和实践性课程的调查,分析了当前上海小学科学教育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从数据呈现、数据分析到结论的得出,全面勾勒了当前科学教育的主要问题与面临的困境。同时,也为教育研究者、科学教师、课程编制专家敲响了警钟。小学科学教育的问题众多,困境重重,通过科学教育实现科教兴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旧任重道远。

(四)对未来的展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因此,科学教育不仅要着眼于当前的教育改革与现状,更要关注未来的科学教育的发展。仅仅认识到小学科学教育的问题是不够的,作者通过思考“做中学”科学教育实验项目的经历,得出了“做中学”昭示了中国未来小学科学教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的结论,为今后中国小学科学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外,作者详细阐释了“做中学”科学教育实验项目的理论基础,并与杜威倡导的“做中学”一般教育理论进行比较,加深了对“做中学”探究式科学教学的理性认识,最终,作者展望了用“做中学”改造小学科学课程的可行性。这对于丰富当前我国科学教育教学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课程视野:小学科学教育的挑战及应对》一书从课程理论的独特视角切入,深入剖析当前我国小学科学教育的问题,努力尝试用“做中学”的探究方式改造小学科学课程,这对于达成提升我国小学生的科学素养的目标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比较教育教授)

传统文化体制亟待革新

■高安宇

社会发展至今,已不单纯是经济、科技发展,更是一个社会文化发展的局面。加强文化科技发展,将会推动社会全面发展进步。

科技文化创新要与实际结合起来,不能搞纯粹与实际无关的学问,科学文化的目的在于改变世界,让人类生活更好,自然要求科学文化与实际相结合,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因此,科技文化人才要深入实际,从实际生活中汲取营养,汲取材料,得以创新。文化技术创新要瞄准世界一流水平,培养世界一流人才,创造世界一流文化。文化科学创新需要人才,更需要一流高水平人才。

文化产业还要不断地吸纳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中国文化有广泛的包容性,能兼容吸纳世界各地的东西,中国文化也能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东南亚、南亚、美洲都有中国文化的身影,中国从古代至今就吸纳各民族文化传统,并发扬光大。我国历史上有几个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历史,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共同繁荣。我国还吸纳外来文化,这些事实说明中国文化是一个能兼容并蓄的文化体系。文化科学创新要不断更新。由于不断交流,人们对文化的欣赏能力水平不断提高,文化产品也要随人们需求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墨守陈规自然会失去群众,失去市场。文化产品要发扬地方特色,成为人才群,人才也形成集团效应。

文化创新体系要改变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改变中国几千年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要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创新。在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思想影响下,许多人认为做官是唯一、的道路,许多有才华的人才,丢弃了科学研究,走上官场道路,这也是我国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今每年的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居高不下,也反映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文化思潮。没有科技,我们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就会亡国,就会被人家欺负。因此,从战略的高度,改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改变官本位体制,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加强文化建设,就要改变传统文化体制,改变传统重视官本位、忽视科技的体制,把重视人才、重视科技作为一种文化时尚,大力宣传。文化科技人才的待遇要高于政府官员,这样,才有利于全社会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的文化氛围。

(作者系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丁邦平